

· 民族国家建构 ·

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阿尔及利亚 民族身份的历史建构*

刘爱娇

内容提要 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构成要素之一，也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书写该国历史的紧要资源。殖民者通过重构阿尔及利亚地区历史与民族形象，塑造了具有“东方化”特征的殖民主义叙事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殖民地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秩序。与此不同，具有不同阶级背景的民族主义者着眼于社会平等地位、独立诉求和文化复兴等现实需求，反思殖民主义叙事中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内涵，提出了多元化的民族主义叙事范式，包括同化主义叙事、梅萨利主义叙事以及伊斯兰改革主义叙事等，这是对殖民主义叙事的解构。民族主义者通过驳斥殖民主义叙事范式，逐步明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并不断通过政治实践的方式完成内部力量整合，推动历史叙事范式的成功转换。这种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转向，恰好映射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而阿尔及利亚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后，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仍持续对国家构建产生影响。在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新时代，民族主义叙事范式仍需不断进行自我丰富、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时代特点与自身国情。

关键词 历史叙事 民族身份 阿尔及利亚 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刘爱娇，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2022级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变迁研究”（23BSS061）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叙事不仅是探究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而且是当今时代推进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近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因“殖民历史记忆”问题屡生争端，甚至一度影响两国外交关系。这种分歧是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历史叙事上的遗留影响和衍生问题。所谓“叙事”（Narrative），其概念在学界暂无公认的定论，但在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叙事”被认为是“感知、组织和建构意义的方式，是一种不同于逻辑和话语思维的认知模式，但绝不亚于逻辑和话语思维”。^① 叙事与人类历史彼此交织，可以说“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②。因而，就历史向度而言，叙事的对象可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切事物。本文“叙事”所指的核心对象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透过三重模仿理论^③的棱镜，可以窥见历史叙事具有主体性、历时性与实践性三大特征。根据叙事的主体性特征，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叙事主体分别为法国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殖民主义叙事是法国殖民者以殖民统治利益出发，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民族界定等内容进行“东方化”的产物。而民族主义叙事是指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基于被殖民现状，通过批判殖民主义叙事而形成的关于自身民族身份的独特释义。这两种叙事的矛盾构成了该国民族主义在殖民统治时期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影响当下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因此，探究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演变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发展脉络，还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早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进行解读的是以法国殖民者为首的西方人。在殖民历史背景下，法国形成了大量以官员报告、旅行游记为载体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历史记载，^④ 进而催生出诸多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研究成果。^⑤ 这些

① Rimmon - Kenan S.,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51.

② [法国] 罗兰·巴尔特著：《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③ 保罗·利科在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基础之上，针对叙事提出了三重模仿理论，即对“经验的叙事性质”的前理解、叙事的自我构造过程、叙事对现实的重塑。

④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法国远征军官员和历史学家对阿尔及利亚的考察为依据。其中，法国历史学家阿列克谢·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于1841年和1846年两次前往阿尔及利亚实地考察，并为法国政府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

⑤ Louis Moll, *Colonisation et Agriculture de l'Algérie*, Paris: Paris Librairie Agricole de la Maison Rustique, 1845; Charles - Robert Ageron,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文本共同勾画了殖民主义叙事的思想底色。进入 20 世纪后,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渐而觉醒,阿尔及利亚人对自身身份产生了不同于欧洲人的新发现与新表述。^① 这些表述构成了民族主义叙事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民族主义事业的实践指导。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这一现象推动了“历史叙事”相关话题成为研究热点。但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研究未能借此机会得以深入,仍停留在分析民族主义发展时期的身份政治化问题^②、关涉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的民族身份识别^③,以及在非殖民化问题上论及民族身份重要性^④等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综上,当前学界在探究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时,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延续性和横向维度的主体间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就纵向历时性而言,拥有迥然相异历史站位的殖民者与民族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书写却联系密切,二者互动的历史甚至影响至今。就横向共时性而言,不仅殖民主义叙事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主体差异,而且民族主义各流派对民族身份的认知与实践之间同样存在分歧与交互。鉴此,本文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呈现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换及实践历程,并分析其对独立后民族国家构建产生的长时段效应,以期为学界客观认知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历史和民族国家构建进程提供新视角。

一 殖民主义叙事中的“东方化”表达

作为 19 世纪西方的重要殖民国家,法国将其扩张的触角伸向了地中海南岸地区。在北非的核心地带,阿尔及利亚不幸成为法国实施其殖民蓝图的关键

① Ferhat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Paris: La Jeune Parque, 1931; 另有穆巴拉克·米利(مبارك بن محمد الميلّي)撰写的《阿尔及利亚古今史》(تاريخ الجزائر القديم والحديث)和陶菲克·马达尼(أحمد توفيق المدني)的《阿尔及利亚书》(كتاب الجزائر)。

② Patricia Lorcin, *Imperial Identities: Stereotyping, Prejudice and Race in Colonial Algeri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4; Maheoud Kaddache, *Histoir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Paris: Paris - Méditerranée, 2000.

③ Jonathan N. C. Hill, “Identity and Instability in Postcolonial Algeria”,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1, 2006;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Mohamed Benrabah,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 - Independence*,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键舞台。为了确保殖民统治的稳固，法国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丰富的民族历史与复杂的族际关系进行重新诠释与界定，并以此作为殖民地社会秩序塑造的思想基础。

（一）“西方的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重构

在法国殖民者入侵前，阿尔及尔摄政国名义上虽然受奥斯曼帝国管辖，但实际拥有高度自治权。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区生活着以“海盗”为生的奥斯曼人及其后裔，而深入内陆则是多个以生业经济为主的部落社会组织分布其间。尽管德伊（Dey）^①在执政期间独揽大权、横征暴敛，但社会发展仍保持缓慢前进态势。

法国殖民者在初入阿尔及利亚时，因实行有限占领政策，对内陆地区柏柏尔^②部落与阿拉伯部落社会的发展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因此只能通过经验式的想象结合碎片化信息，拼凑出可以赋予法国殖民统治合法性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其中，殖民者明显滥用了罗马帝国在非洲地区的历史遗产。一方面，法国将阿尔及尔摄政国时期的地区历史简化为奥斯曼人的蛮力入侵与暴力压迫，忽视了阿尔及利亚自身的历史发展链条。“阿尔及利亚多次遭受入侵的历史使其种族构成变得复杂，进而未能形成一个具有统一领土认同的民族”。^③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给法国议会的报告中称：“所谓的土耳其政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征服的延续。”^④另一方面，殖民者重新释义了罗马帝国在非洲的历史，并标榜自身有传播宗教精神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国远征军出征非洲前，国王要求“主教们向法国社会宣传远征军的正直精神。他们应该将士兵描述为圣路易斯的儿子，是带有基督教英雄主义精神的新十字军，要将基督教的祝福带给阿尔及尔那些不幸的居民。”^⑤法国

① 德伊是阿尔及尔摄政国最高长官的称号，1671年起掌权至1830年结束，由奥斯曼近卫军长官会议推举产生并由奥斯曼帝国政府授予权力。

② “柏柏尔”一词本意为“野蛮的、未开化的”，初为外族人入侵时对北非地区原住民的蔑视性称呼。但该词的负面含义随历史的发展逐渐淡化消失，成为特指这些居民的专有名词。

③ Walid Benkhaled and Natalya Vince, “Performing Algerianness: The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Algeria’s ‘Culture Wars’”, in Patrick Crowley ed., *Algeria: Nation, Culture and Transnationalism 1988–2015*,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45–246.

④ Alexis de Tocqueville, “First Letter on Algeria (23 June 1837)”, in Jennifer Pitts ed. and trans., *Writing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

⑤ Jennifer E. Sessions,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0.

通过十字军精神激励远征军的同时，也借此巩固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在推进军事占领的过程中，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地区格外重视，其原因不仅在于该地区的地缘价值和商业价值，更因该地区与罗马帝国具有深厚的历史联系，由此间接证明法国作为帝国遗产继承者身份的合理性。此外，法国政府还通过科学、宗教、文学和神话4个维度的知识生产占有罗马帝国的遗产，巩固法国的继承者身份。^①

总之，殖民政府通过捏造阿尔及利亚历史、占有罗马帝国的遗产，重塑了一个“西方的阿尔及利亚”。在殖民者的叙事框架中，阿尔及利亚是罗马帝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法国作为罗马帝国在非洲地区的继承者，有能力、有义务带领阿尔及利亚从被压迫走向“文明”。法国远征军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向当地居民承诺：未来在法国的统治下，穆斯林将自由行使宗教权力，确保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财产、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权利不受到任何侵犯，女性也会受到尊重。^②

（二）“西方化的阿尔及利亚人”：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主要民族形象的重构

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启蒙时代使欧洲国家以极度自信的姿态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以“文明优越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观。随着西方国家在海外地区的殖民扩张进程，这种观点逐步从文化理论走向实践，具体化为“文明使命论”。^③ 据此，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与自身的差异，犹如一个新生社会和一个经过15个世纪沉淀、发展至成熟的社会之间的鸿沟，更是九成半人口仍处于野蛮状态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全部人口处于绝对文明状态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鲜明对比。^④ 为了论证“文明使命论”的科学性，殖民者重新界定了阿尔及利亚地区的柏柏尔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形象。此外，殖民者进一步通过重构二者的族际关系以重新架构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殖民者创造了卡比利亚（Kabylia）神话，并塑造了阿拉伯人的

^① Patricia M. E. Lorcin, "Rome and France in Africa: Recovering Colonial Algeria's Latin Past",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5, No. 2, Spring 2002, p. 296.

^②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9.

^③ “文明使命论”是指欧洲殖民国家有责任通过一切手段将自身优越的文明传播给非西方地区的劣等、不文明民族，以提升其文明水平。

^④ Jules Duval, *l'Algérie et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Guillaumin, 1877, p. 66.

“野蛮”形象。殖民者透过种族主义棱镜勾勒出柏柏尔人与法国人的亲缘关系，通过“卡比利亚神话”分化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据此，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是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种族，柏柏尔人在各个层面都具有天生优越于阿拉伯人的民族特质，虽“皈依于伊斯兰教但从未成为虔诚的信徒”^①。在殖民主义叙事中，柏柏尔人与欧洲人的共同特征相较于阿拉伯人更为显著。比如，二者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具有民主特征等。^②甚至还从生理特征角度论证了二者性格与习惯不同的根源在于卡比利亚人的头骨前侧较阿拉伯人发达，以此为种族主义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成为“野蛮”的代名词。法国殖民者入侵前，法国主教们将阿尔及尔描述为“反基督教的野蛮海盗巢穴”，这里居住着“愚蠢和堕落的民族”。^③不仅如此，殖民者还声称阿尔及利亚的广袤土地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是因为阿拉伯人的懒惰。在此基础上，法国殖民者得出一个带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结论：“阿拉伯人世代相传的恶劣品性会导致他们永远处于生活的困苦与道德的沦丧中”。^④殖民者认为，以阿拉伯人为代表的“野蛮”人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已经维系了几个世纪的“邪恶”文明。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后，法国政府谴责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人堕落的根源，同时认为穆斯林遵守的法律也是“愚蠢”的。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被欧洲移民称为“天生的孩子”，认为阿拉伯人不配拥有权利。^⑤这种喻化将阿拉伯人贬为智力低下、落后的种族群体。实际上，殖民者塑造卡比利亚神话和阿拉伯人野蛮形象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强化身份认同的差异实现分而治之，进而实现“文明使命”。这一叙事在以法国文明为准绳、勾勒阿拉伯人“野蛮”形象的同时，也体现了殖民者对柏柏尔人的拉拢和对阿尔及利亚殖民社会“自我”身份的强化之意。

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叙事将欧洲移民群体整合为“阿尔及利亚民族”的主体。随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军事征服活动的结束，其治理方式逐渐向民政

① Paul Silverstein, “Realizing Myth: Berbers in France and Algeria”, *Middle East Report*, July 1996, p. 16.

② F. de Riols de Fonclare, “Les Divers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et Leurs Applications Pratiques a l’Algéri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19, pp. 194 – 195.

③ Jennifer E. Sessions,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 p. 40.

④ Auguste Pomel, *Des Races Indigènes de L’Algérie et du Rôle que Leur Réservent Leurs Aptitudes*, Oran: Impr. de Vve Dagorn, 1871, p. 17.

⑤ Mohamed Benrabah,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 – Independence*, p. 29.

治理转变，“文明使命论”的指导思想也随之更加具象为“文明同化政策”。所谓“同化”，即在殖民者的统治下，阿尔及利亚将在任何方面无限趋近于法国。^①而实现同化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实施移民政策，即从法国及地中海周边的欧洲国家吸引人口至阿尔及利亚定居。移民进程早在军事征服阶段便已开始，1838年第一批法国移民前往阿尔及利亚，标志着移民活动进入官方引导阶段。在政府的助推下，1849年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移民人数在当地达到14.6万人，^②1876年达到34.4万人，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1/10，^③二战后其规模达到100万人。在法国殖民政府的官方语境中，“阿尔及利亚人”这一表述大多指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欧洲移民，而该地区的穆斯林则用“土著人”一词指代。

随着愈来愈多的移民进入阿尔及利亚，原住民成为殖民当局保障移民群体生活条件的牺牲对象，其社会生活空间因人口密度剧增而迅速萎缩。欧洲移民同样受“文明优越论”的驱动，强化自身与阿尔及利亚原住民之间的差异性，间接推动了“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形成。在此情况下，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主要矛头也从区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转变为区分欧洲移民和原住民群体。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化是人为构建的产物，是欧洲移民在建设“法国的海外属地”时排斥阿尔及利亚原住民这一“他者”的直接结果。

（三）“被构建的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叙事指导下的具体实践

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历史和民族形象进行重写的目的在于，为殖民地社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在殖民者塑造的社会架构中，移民群体与原住民之间存在的二元分割现象横跨社会的政治舞台、经济领域以及文化层面，两大社群之间形成了一种移民群体普遍占据优越地位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及霸权关系”^④。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殖民者牢牢地把控着讲述与诠释阿尔及利亚身份的话语权，阿尔及利亚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声状态，更遑论现实权力的实现。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First Report on Algeria (1847)”, in Jennifer Pitts ed. and trans., *Writing on Empire and Slavery*, p. 162.

② [阿尔及利亚] 卡迪尔·阿里著：《阿尔及利亚地理·自然、人文、经济》，唐裕生、吴永华、顾正龙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8页。

③ 赵慧杰编著：《列国志·阿尔及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④ [美国] 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振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第一，在政治领域，原住人口成为没有公民权的“国民”。尽管阿尔及利亚被法国视为“领土的自然延伸”，^①但是从未与法国大陆有过一致的法律制度。^②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中，公民身份是一个国家正式成员的标志，是公民个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对殖民者来说，公民身份同样是塑造殖民地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殖民当局通过公民身份的赋予权主导殖民地社会发展。“殖民地的原住民是法国的臣民，而非公民”，^③这种社会秩序使阿尔及利亚社会内部出现断裂，同时也加深了移民群体与原住民群体间的对立关系。

第二，在经济领域，原住人口成为低廉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殖民统治者的手段深刻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结构。他们通过摧毁传统的土地所有制，有效瓦解了原有部落社会组织，将大多数原住民强行拉入一个全新的、由移民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从1883年到1899年的16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原住民就失去了占总耕地面积2/5的土地。^④移民群体摇身一变成为阿尔及利亚大多数土地的所有者，而原住民则逐渐沦为无产阶级，成为农场中的雇佣工人，或是城市中的劳动阶级，抑或是背井离乡去往法国等地的务工人员。城市中的阿尔及利亚工人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其工资却仅为工作8小时的欧洲籍工人的一半。^⑤为寻求较高的工资收入，大部分无产阶级选择前往法国务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将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称为“无产阶级在法国的社会”。^⑥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颠覆，更是对他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权益的严重剥夺。

第三，在文化领域，原住人口成为被贬低、被同化的对象。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由原住民组织推进的抗法运动曾一度构成殖民者在入侵初期难以深入腹地的主要障碍。因此，法国远征军将伊斯兰教视为征服活动中阻碍因素

① Pierre - François Gonidec, “l' Association des Pays d' outre - mer au Marché Commu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 1958, p. 599.

② Ibid.

③ F. de Riols de Fonclare, “Les Divers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et Leurs Applications Pratiques a l' Algérie”, p. 201.

④ Victor Piquet, *La Colonisation Francaise Dans La' frique Du Nord: Algérie Tunisie Maroc*, Paris: A. Colin, 1914, p. 208.

⑤ 熊忠英著：《阿尔及利亚》，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0页。

⑥ Allison Drew, “Bolshevizing Communist Parties: The Algerian and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48, No. 2, August 2003, p. 174.

的主要源头,认为“马拉布特和苏非兄弟会掌握着神秘的权威,能够将信徒组织成潜在的暴力团体”。^① 尽管殖民者最终平息了抗法运动,但殖民者仍将伊斯兰文化视为潜在威胁,甚至为消解这种文化威胁,不断利用阿尔及利亚抗法运动领袖阿卜杜·卡德尔的象征意义构建不同的形象服务于殖民统治。^② 同时,殖民当局对阿拉伯文化进行强力打压,阿拉伯语教育仅限于对《古兰经》文本,^③ 不允许日常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14世纪曾是伊斯兰文化明珠的特雷姆森,在殖民同化政策下风貌巨变,昔日随处可见的阿拉伯文消失殆尽,这成为殖民时代文化压迫的无声见证。在殖民统治政策的作用下,1954年的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原住民没有接受过阿拉伯语教育,85%的儿童没有在法国人开办的学校就读,^④ 原住民的文盲率高达90%。^⑤

综上,法国在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过程中,精心织就了一套殖民主义的叙事逻辑,试图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身份纳入其话语体系之中。法国通过将殖民行为美化成一场“文明的交流与提升”,以掩盖其背后的扩张野心与剥削本质。殖民主义叙事起初或许还带有传统东方学的色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演化为一种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知识生产工具。通过这种方式,法国殖民者在强化对阿尔及利亚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对受殖者的自我身份与历史认知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变革上,还深刻地影响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心理和社会心态。然而,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地区历史的重写,还是对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压迫,殖民主义叙事都未能彻底实现对该地区文明与社会的同化。相反,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不仅让移民群体更加担忧自身特权可能丧失,同时也为民族主义者开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和表述空间。

① Paul A. Silverstein, *Algeria in France: Transpolitics, Race, and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0.

② 慈志刚:《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建构》,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1期,第32~36页。

③ 郑家馨著:《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页。

④ Gilbert Meynier, “Profils Sociaux et Nationalisme Algérien: l’Exemple des Neuf «Chefs Historiques»”, *Arabica*, Vol. 42, No. 2, 1995, p. 171.

⑤ Phillip C. Naylor, *France and Algeria A History of Decolo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8.

二 民族主义叙事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多元表达

民族主义叙事与殖民主义叙事在历史站位上截然不同。民族主义叙事极力寻求一个新的叙事框架，以期表述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独特性。然而，在殖民统治期间，民族主义叙事难以完全摆脱殖民主义叙事的深层影响，尤其是在塑造与民族身份紧密相关的内容之时。其实，“单纯的民族主义认同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相互规定、相互影响来认定其身份的，身份也就成为多种文化的‘共同制造物’（co-production）。”^① 基于对殖民主义叙事作出反应的底层逻辑，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从日益分化的社会现象出发，尝试进行自我发现和表述。不同阶层背景的民族主义群体提出了多种叙事路径，力图打破殖民主义所构建的身份叙事桎梏，寻求自我定义和表达空间。

（一）谋求以民族同化促平等的同化主义叙事

同化主义思潮是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实施“文明同化”政策的逻辑必然结果。这一思潮的倡导者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社会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拥有法国文化教育背景。由于对既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深感不满，他们主张通过同化途径来实现阿拉伯人在权力与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进而推动阿尔及利亚社会全面融入法国社会。

同化主义视角下的民族身份内涵是以实现社会权力、地位平等为核心诉求而展开论述的。在这一过程中，同化主义者基于反对殖民主义叙事中固有的文明不对等地位，并形成了“阿尔及利亚人”这一概念的雏形。1907年，同化主义者在侨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中成立了青年阿尔及利亚党（The Young Algerians）。青年阿尔及利亚党的成员哈立德·本·哈希姆（Khalid ibn Hashim）^② 曾于1913年公开表达诉求：阿拉伯人并非是一个低等民族，我们来自高度发达的社会，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原则

^① 刘鹏：《从边缘到中心——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第72页。

^② 作为阿卜杜·卡德尔思想遗产的直系继承人，哈立德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立场从初期的同化主义逐渐转向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

有着充分的理解与实践。^① 哈立德否认阿拉伯人的“低等”属性，强调阿拉伯人与法国人一样，在谋求平等的道路上拥有共同的诉求和权利。1938 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 of the Algerian Manifesto, UDMA）继承了同化主义思想，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导者。阿巴斯认为“不存在阿尔及利亚民族”，^② “如果我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那么我将是一名民族主义者……我查阅历史、走访民众、参观墓地，都没有发现阿尔及利亚民族存在的痕迹。”^③ 在阿巴斯的观点中，尽管否定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一概念，但暗含着“阿尔及利亚人”这一特殊身份的内涵。阿巴斯还论述了同化主张的合理性在于，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核心是伊斯兰教信仰”^④，而“《古兰经》没有禁止穆斯林融入非伊斯兰国家”^⑤。阿巴斯不仅从伊斯兰教层面为同化主义思潮找到了深层次的合理依据，更在世俗层面上对法国的殖民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法国的统治政策与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现实情况也与其标榜的“文明使命”大相径庭；既然法国法律将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的一部分，那么阿尔及利亚人也应该是法国人。^⑥

总之，阿尔及利亚同化主义者的叙事致力于摆脱殖民主义叙事塑造的“野蛮”阿拉伯人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对殖民政策的种种错误进行批驳。他们进一步提出，阿拉伯人与法国人只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人。这一观念旨在为实现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奠定思想基础。然而，同化主义者过于急切地想要解决社会地位不对等的问题，却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实际存在。他们将融合同化的精英思想视为一种合理诉求，但这种自我“东方化”的表述，在实践层面上并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接受。

① l'Émir Khaled, *Réflexions sur le Rapprochement Franco-Arabe en Algérie*, Alger: Imprimerie Gojosso, 1913, pp. 4-17.

② [法国] 马赛尔·艾格列多著：《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维泽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版，第 143 页。

③ Claude Collot, Jean-Robert Henry, and Ahmed Mahiou,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Textes 1912-1954*, Paris: l'Harmattan, 1978, pp. 66-67.

④ John Ruedy, “Chérif Benhabylès and Ferhat Abbas: Case Studies in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Mission Civilisatric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Vol. 28, No. 2, 2002, p. 201.

⑤ Claude Collot, Jean-Robert Henry, and Ahmed Mahiou,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p. 67.

⑥ John Ruedy, “Chérif Benhabylès and Ferhat Abbas: Case Studies in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Mission Civilisatrice’”, p. 199.

（二）主张民族独立的梅萨利主义叙事

梅萨利主义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思想流派之一，以其代表人物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名字命名。在其发展初期阶段，核心成员是旅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群体，核心目标是“捍卫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穆斯林的利益”。^①这种鲜明地具有泛马格里布色彩的思想，随着流派本土化发展程度的提升而逐渐淡出。不同于同化主义，梅萨利主义者主张反对法国的帝国霸权和殖民统治，实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在梅萨利主义者看来，民族身份构建是在政党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主要通过彻底区分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驳斥同化思想，以及肯定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实际存在等方面展开。在殖民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务工人员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这不仅让他们看到了法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困境，也激发了他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深刻反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务工群体于1926年成立了北非之星党（North African Star, ENA），这是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独立主张的民族主义政党。北非之星党官方报纸《乌玛报》（*El - Ouma*）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坚定地表达了他们对殖民主义叙事和同化主义叙事的反对立场，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探索努力。有文章指出，“穆斯林从来都不是法国人，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法国工人所处的困境时，我们就知道：即使我们获得了公民身份，也无法摆脱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②这一观点不仅明确区分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同时也从根本上驳斥了同化主义者的主张，指出同化并非解决不平等的有效途径。他们坚定地认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拥有辉煌的历史、宗教和完全不同于法语的语言”，^③这进一步肯定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独特性。193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党（Algerian People's Party, PPA）成立，该党在北非之星党的基础上，更聚焦阿尔及利亚本土问题，致力于建立“阿尔及利亚完全主权、制宪会议和摆脱殖民统治压迫结构的公民

^① Maheoud Kaddache, *Histoir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Tome 1 (1919-1939)*, Paris: Paris - Méditerranée, 2000, p. 242.

^② Rabah Aissaoui, “‘Combattons Pour Rester «Algériens … algérie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the Étoile Nord - Africaine (ENA) and the Parti du Peuple Algérien (PPA) in Inter-war France”,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13, No. 2, May 2005, pp. 213 - 215.

^③ Benjamin Stora,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loniale (1830-1954)*,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1, p. 85.

自由社会”。^①这一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梅萨利主义者叙事中关于民族独立与自由核心理念。梅萨利本人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指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拥有母语、宗教、辉煌历史、思想家、英雄和伊斯兰传统的国家。^②这些元素共同象征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具有独特身份和文化底蕴，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

梅萨利主义叙事范式是作为实现独立政治目标的先验条件而被提出的。由于其强烈的现实应用导向，该叙事虽被广泛传播，但其自身的理论深度仍有待挖掘。这种叙事的主要内容大多聚焦于揭示殖民统治的不合理性，然而，它对殖民主义叙事的解构并不彻底。这也是当殖民统治终结时，梅萨利主义叙事的存在感持续减弱的原因之一。但与梅萨利主义叙事范式不同的是，伊斯兰改革主义叙事则从文化层面出发，细致且有力地反驳了殖民主义叙事，为民族身份的构建贡献了非凡的力量。

（三）强调民族存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叙事

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倡导者包括宗教人士和在阿尔及利亚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教师，其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elhamid Ben Badis）。与同化主义者、梅萨利主义者具有鲜明政治立场不同的是，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在发展初期只关注文化发展，避而不谈政治权利。该派别主张回归《古兰经》与先知“圣训”以净化伊斯兰信仰，认为法语及其文化的传播威胁了阿拉伯文化的发展，试图通过伊斯兰教的回归与阿拉伯语的复兴唤醒原住民的民族意识。然而，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对本土文化的破坏使该派别的文化斗争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领域。该派别主张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文化权力，因其诉求的相对温和，故被称为伊斯兰改革主义。

伊斯兰改革主义视角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构建建立在宗教、国土、语言3个维度基础之上。乌里玛协会成员陶菲克·麦达尼用阿拉伯语撰写的《阿尔及利亚史》^③于1931年出版，封面上写着乌里玛协会的箴言：“伊斯兰

^① Geoffroy de Laforcade, “Hadj, Messali (1898–1974) and Algerian Nationalism”, in Immanuel Ness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Revolution and Protest*, Chichester: Wiley – Blackwell Press, 2009, p. 4.

^② “Un Article de Messali Hadj: «La Dissolution de l’Etoile Nord – Africaine» (La Gauche Révolutionnaire, n° 15, 1er mars 1937)”, in Daniel Guérin, *Ci-gît le Colonialisme: Algérie, Inde, Indochine, Madagascar, Maroc, Palestine, Polynésie, Tunisie; Témoignage Militant*, La Haye, Paris: Mouton, 1973, pp. 307 – 309.

^③ 除艾哈迈德·陶菲克·麦达尼（أحمد توفيق المدني）的《阿尔及利亚史》（*كتاب الجزائر*）外，还有穆巴拉克·本·穆罕默德·米利（مبارك بن محمد الملي）撰写的《古今阿尔及利亚史》（*تاريخ الجزائر في القديم والحديث*），二者都是乌里玛协会成员对本民族历史写作的初步尝试。

教是我们的宗教，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国家，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①。此后，这句箴言成为伊斯兰改革主义对民族身份的核心叙事内容。另一位成员穆巴拉克·本·穆罕默德·米利实现了对殖民主义叙事的理论祛魅，明确否定法国殖民者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以及法国宣称的“文明使命论”，并否认了柏柏尔人与欧洲人间的紧密关系。^② 乌里玛协会成员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撰写是对殖民主义叙事的矫正，同时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非殖民化历史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1936年，巴迪斯提出，“我们也‘研究了历史’，确实发现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民族像地球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传统，这个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不可能是法国，也不希望变成为法国。”^③ 巴迪斯不仅反驳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不存在”“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社会同化”等观点，同时通过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表达构建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基础内涵。

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共产党（Algerian Communist Party, PCA）在这一时期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探索道路中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组织在1936年前隶属于法国共产党，其实际主张与实践都与法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即使该组织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本土化程度也十分有限，再加上他们开展的反殖民斗争均基于阶级立场，因而对阿尔及利亚历史和民族性的发现与阐释严重不足。直到1947年，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国家理论，仍认为阿尔及利亚尚不具备成熟国家的条件，还只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同年发表的关于北非地区局势的报告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⑤。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基于组织力量受限、思想本土化程度低等原因，始终未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叙事观点。

实际上，民族主义者书写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是以反驳殖民主义叙事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区别于法国文化的具有自身特性的民族概念。各民族主义派别提出的多元叙事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对殖民主义叙事进行解构，从驳斥

① Phillip C. Naylor, *France and Algeria A History of Decolo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 9.

② Maheoud Kaddache, *Histoir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Tome I (1919 - 1939)*, p. 208.

③ Claude Collot, Jean - Robert Henry, and Ahmed Mahiou,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pp. 68 - 69.

④ Jacques Cantier, *l'Algérie sous le Régime de Vichy*, Paris: Odile Jacob, 2002, p. 342.

⑤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French North Africa”, December 18, 1947,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Gale Group, Inc., CK2349393403.

文明使命指导下的种族观念表述到区分人群上的自我与他者以反对同化政策，再到重写历史明确自身民族特性等方面，都试图削减殖民主义叙事的影响力。然而，任何叙事范式的提出都并非孤立于现实的抽象构想，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应用性。在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不仅是对既有现实的反思与总结，更是对未来政治实践的指导与引领。因此，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叙事范式也必然需要在政治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三 民族主义多元叙事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话语整合

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复杂历史脉络中，民族主义多元叙事在面对强大的殖民主义力量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内部张力，不仅无法动摇殖民主义叙事根基，其政治实践亦陷入困境。民族主义叙事内在的分散与碎片化，削弱了其整体凝聚力及其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效能。同化主义叙事否认“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实际存在，并试图以此论证阿尔及利亚社会与法国社会的可融合性来寻求一种和解路径。然而，这一观点不仅遭遇了伊斯兰改革主义者的强烈批驳，同时也为梅萨利主义者所轻视。因此，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如何在内部寻求身份叙事的共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民族主义多元叙事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困境

第一，同化主义者陷入身份融合的排异困境。同化主义者试图通过文化、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交融，实现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的身份平等。然而，这一愿景在实践中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尤为突出的是，同化主义者所保留的穆斯林身份前提与殖民当局旨在消除文化差异的同化目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这不仅阻碍了同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还导致了同化主义者自身身份的模糊与异化。在长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斗争中，同化主义者既无法彻底融入法国社会，成为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又无法为阿尔及利亚的传统穆斯林社会所接受。这种双重排斥使得同化主义者成为一个游离于两大社会群体之外的“第三群体”。他们既不属于法国社会，也不完全属于阿尔及利亚社会，而是处于一种身份上的悬空状态。这种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的异化现象，是殖民者同化政策与“分治”统治策略实行的必然结果。同化主义者

试图通过强制性的文化同化来消除殖民地居民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差异，而“分治”统治策略则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在这种背景下，同化主义者作为一股试图跨越种族、文化和宗教界限的力量，其身份叙事及认同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

第二，伊斯兰改革主义者的文化推进策略陷入困局。该派别发展初期的叙事表达始终围绕文化层面展开，拒绝谈及政治层面的实践，但文化导向性决定了其实际诉求的难以实现。20世纪30年代，随着阿尔及利亚城市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乌里玛协会领导的宗教与文化复兴运动迅速发展。殖民当局为避免宗教活动威胁殖民统治的稳定，下令禁止学者在由政府直接监管的“官方”清真寺里宣讲宗教知识，也不允许他们教授阿拉伯语和设办免费学校。不仅如此，殖民当局还没收了乌里玛协会的阿拉伯文报刊。^① 殖民当局对宗教学校与媒体的严格管控，使乌里玛协会停留在文化层面的民族身份叙事陷入空谈困境。此外，该阶层成员试图通过修正历史唤醒民族主义意识的目的与殖民主义叙事维护统治的目的相悖，^② 因此，伊斯兰改革主义走向政治化发展道路是必然趋势。

第三，梅萨利主义者过于激进化的叙事表达导致组织屡次被取缔，难以持续展开有效活动。梅萨利于1936年8月在阿尔及利亚市政广场上，对2万群众呼吁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完全独立，^③ 他们一贯的反殖民立场直接导致北非之星党在法国被禁。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提出了旨在给予精英阶层政治权利的《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Blum - Viollette)，但该法案遭到梅萨利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其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来分裂穆斯林群体。^④ 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立后，因激进的独立立场吸引大量城市平民与小资产阶级，但过于激进的话语屡致组织被取缔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基于此，陷入发展困境的各民族主义派别不得不重新思索政治实践方式，互相合作成为首选。实际上，各派别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根本立场的相似性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契机。民族主义者的多元叙事大多集中批驳阿尔及利亚

① أبو القاسم سعد الله، الحركة الوطنية الجزائرية، ج ٣: ١٩٣٠-١٩٤٥، بيروت: دار الغرب الإسلامي، ١٩٩٢م، ص ٢٢.

② مبارك بن محمد الميلي، تاريخ الجزائر في القديم والحديث، ج ١، الجزائر: المؤسسة الوطنية للكتاب، ص ٣٧.

③ Geoffroy de Laforcade, "Hadj, Messali (1898 - 1974) and Algerian Nationalism", in Immanuel Ness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Revolution and Protest*, p. 2.

④ Charles - Robert Ageron, *Modern Algeria: A History from 1830 to the Present*, p. 97.

人是法国人的观点，也反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有朝一日会成为法国人的观点。^① 即使是最初主张同化的阿巴斯，后来也一改往日态度称“既然不允许我们成为法国人，那我们将会成为其他人”^②，这种表述为该流派的民族主义叙事增添了激进色彩，使其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与其他民族主义力量的合流成为可能。

（二）民族主义叙事指导下政治实践的合作路径探索

梅萨利主义者、伊斯兰改革主义者与同化主义者的第一次合作尝试是在 1944 年，共同组建的自由与宣言之友（Friends of the Manifesto and Freedom, AML）主张以和平方式在法国框架内建立阿尔及利亚自治国家。这是阿尔及利亚各民族主义流派第一次围绕民族问题实现真正联合，合作得以开展的契机是“人民自决权”的提出。阿巴斯随即提出阿尔及利亚人同样应该拥有自决权并起草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该宣言呼吁制定一部单独的阿尔及利亚宪法，保证多数穆斯林能够立刻、有效地参与政治。^③ 1943 年 5 月，戴高乐称，“民族团结的原则是法国对帝国所有地区拥有完全主权”，^④ 这一言论虽未明确回应宣言诉求，但间接否定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的提议。

乌里玛协会在这次合作中呼吁阿尔及利亚人“不要忘记自己首先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但同时认为依靠阿尔及利亚的自身力量不足以保卫自己，应该在法国保护下建立民主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发生在 1945 年 5 月的塞提夫大屠杀事件^⑤则使民族主义者的叙事走向激进化。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为此呼吁“阿尔及利亚人为民族烈士报仇”^⑥。自由与宣言之友分裂为以阿巴斯为首的

^① Rabah Aissaoui, “‘Combattons Pour Rester «Algériens … algérie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the Étoile Nord - Africaine (ENA) and the Parti du Peuple Algérien (PPA) in Inter-war France”, p. 215.

^②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 1541 - 19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7.

^③ Michael Crowd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67.

^④ Maheoud Kaddache, *Histoir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Tome II (1939-1951)*, Paris: Paris - Méditerranée, 2000, p. 603.

^⑤ 1945 年 5 月 8 日，阿尔及利亚塞提夫爆发反殖民游行，遭法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引发报复冲突与军方二次镇压，导致大量平民死伤。许多阿拉伯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

^⑥ Allison Drew, *We are No Longer in French: Communists in Colonial Alger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6.

温和派和以梅萨利为首的激进派。梅萨利还曾私下策划了一场民众起义，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这表明两个派别关于政治化发展道路的分歧从未弥合。^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第二次合作是在 1951 年。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呼吁共同组建全国性民主阵线，各派别再次走向合作，成立“阿尔及利亚保卫和尊重自由阵线”（Algerian Front for the Defence and Respect of Liberties）。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尽管并未产生关于身份叙事的建设性话语，但此次提议符合各民族主义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探索有效政治实践的现实需求。1951 年 8 月，阿尔及利亚保卫和尊重自由阵线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作为统一的反殖民主义阵线，要孤立帝国主义者，分散他们的后备力量，削弱他们的地位，包括削弱他们在准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地位。”^② 但各派别在具体事务的抉择和民族身份叙事的表述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很快导致组织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各民族主义派别在实践中从各自为战的局面逐渐转为寻求合作，表明其发展已经出现合流趋势。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席卷亚非拉地区，武装斗争夺取自由的论调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1954 年越南战争的爆发引发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广泛关注，《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入更激励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中的激进派，使其坚信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性。面对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法国总统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仍否认阿尔及利亚存在民族问题，声称该地区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有 120 万法国人，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③ 但依靠移民群体的存在证明殖民统治合法性的说辞，只会让阿尔及利亚人更加坚定反法立场。

（三）民族解放运动对民族主义多元叙事的整合

1954 年 11 月 1 日，在以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为首的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 for Unity and Action, CRUA）的领导下，

^① William B. Quandt, “l’UDMA et les Udmiste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3, 2018, p. 503.

^② [苏联] 波斯别洛娃著：《阿尔及利亚（经济政治概况）》，刘素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 101 页。

^③ 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 102 页。

阿尔及利亚奥雷斯山区多个地点同时爆发武装起义。面对起义的迅猛势头，法国殖民者使用炸弹、坦克等现代武器镇压起义，屠杀老弱妇孺。法军的残暴行为成为最终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温和派人士推向武装反抗道路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起义军发布“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事业战士”的宣言，将反殖民立场作为统一身份表达的基础，称“根据革命的原则，行动只指向殖民主义这个唯一的敌人，并拒绝用和平斗争的方式实现自由，要在伊斯兰教原则的范围内，重建民主的和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主权国家”^①。此次起义暂时弥合了阿尔及利亚各政党之间的分歧，联合为统一阵线，^②正式开启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民族主义者的多元叙事就此正式整合，形成了统一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内涵并建立组织。

第一，形成了以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以下简称“民阵”）为首的统一领导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改组为民阵，并于 1956 年确立对解放战争的领导权。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称，“民族解放军使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自尊的新觉醒，也决心要统一所有阿尔及利亚人的政治思想，通过民族的一致性确保武装斗争胜利的到来”。^③民阵的领导权建立在取缔或边缘化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基础上，强调政党代表的唯一性。民阵认为梅萨利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已经失去其价值，甚至梅萨利本人也成为殖民者分裂民族主义力量的工具，还指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对阿尔及利亚本身的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无法为革命做出实际贡献。^④民阵通过强硬手段整合了力量分散的各民族主义流派，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统一战线，并确立了对民族身份叙事的话语权。它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阐释与重构，塑造了符合自身利益与理念的民族身份叙事。这种整合方式的必要性是由历史决定的，一方面，阿尔及利亚被殖民前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阶层，因而在被殖民期间也没有形成具有绝对精神领导价值的政治派别，导致反殖民初期呈现多中心特征；另一方面，

① 《宣言：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事业战士！》，载《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版，第 201 页。

② Hussein Ait Ahmad, “Alger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Pakistan Horizon*, Vol. 8, No. 1, 1955, p. 286.

③ 《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保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载《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149 页。

④ 同上文，第 153 ~ 156 页。

在法国殖民统治下，阿尔及利亚本土文化被削弱、磨灭。阿尔及利亚社会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缺失决定了民族主义叙事及身份整合必然通过强力领导才能实现。

第二，民阵定义了统一的阿尔及利亚属性。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维系各流派统一的反殖民立场消散，亟需丰富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新时代内涵，以保障统一民族国家的顺利建立。1962年6月，民阵在的黎波里召开会议，商议国家发展蓝图。会议通过的《的黎波里纲领》称，法国殖民者早在19世纪中叶就企图在阿尔及利亚再版15世纪以来在美洲消灭印第安社会的计划。这一异乎寻常的计划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由一个自觉而发达的民族所组成的阿尔及利亚社会40年来能够动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财富应对这种危险。^①这不仅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成果的肯定，也指出了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的错误认知。此外，民阵还强调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以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文化为底蕴，这种文化底蕴并不低于世界其他文化。民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指出，阿尔及利亚民族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穆斯林的特性仍是阿尔及利亚特性的基础。^②本·贝拉总书记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阿尔及利亚过去是、将来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遵循者；殖民主义所宣传的伊斯兰教是障碍这一观点，被我们用革命证明了伊斯兰教把人类团结和社会正义发展到了最高水平。^③

第三，民阵重塑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它把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公元八世纪，并将阿尔及利亚领土范围初步形成的时间追溯至16世纪，这表明在法国殖民侵略前夕阿尔及利亚已然自成一个国家。^④民阵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重新表述逐一对殖民主义叙事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和民族身份进行回应，指出其殖民主义目的与谬误，修正了殖民主义叙事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扭曲与诋毁。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叙事不仅纠正了殖民主义叙事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东方化”表述，还在整合多元叙事的基础上实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的

① 《的黎波里纲领》，载《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01页。

② 《阿尔及尔宪章》（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纲领），载《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39~40页。

③ 《阿尔及利亚民阵党总书记本·贝拉的报告（开幕词）》，载《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4页。

④ 《阿尔及尔宪章》（阿尔及利亚民阵党纲领），第39~42页。

解放。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互动中实现了从外在视角构建到内在视角释义的转变，这不仅勾画出民族主义者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发展线索，更是对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历史叙事转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身份作为一种主体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具有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通过自我持有的观念或他者持有的观念可以被构建。^① 在内在视角的释义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身份不再是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成为一种主动塑造的力量，成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民族身份这一重要资源的争夺历史，对民族国家的建设仍具有显著影响，以一种更为复杂和隐蔽的方式延续至独立后的社会生活中。

第一，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历史叙事成为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政治资源。政治化倾向作为殖民主义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共同的鲜明特征得到历史延续。独立后，民族主义叙事的内涵、发展历史都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基础内容。一方面，叙事之争的演变历程成为衡量和构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独立初期，基于反殖立场而联合的阿尔及利亚各方力量再次发生分化，但并未否定已形成的民族身份历史叙事，反而成为进一步丰富民族身份内涵的历史基础。1962年通过的《的黎波里纲领》表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话语在新阶段“已从反殖民主义转向反封建主义，应继续团结各方力量构建新的民族国家”，^② 叙事内容由此成为丰富民族身份的历史基础。此外，在叙事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民阵与军队力量，均成为国家建设中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民族身份内涵的动态发展使其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在民族国家构建阶段，对历史的矫正书写是推进非殖民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近年，阿尔及利亚高度重

^① [美国]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② 《的黎波里纲领》，第187~225页。

视媒体和历史读物对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书写与宣传，从考古、文献等方面追溯国家历史根源，巩固民族身份记忆。阿尔及利亚官方媒体《圣战者报》在阿尔及利亚独立60周年之际刊发的文章将该国历史上溯至千年前，这在增强民族自信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叙事下的阿尔及利亚形象。^①

第二，殖民统治时期民族主义叙事的多维表述形成历史惯性，影响独立后民族国家的党政关系发展。为确保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顺利过渡，独立后民阵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组织，拥有建设国家机制的话语主导权。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在身份表述与政治表达上的失声成为20世纪末国内动荡的根源之一。政治空间的紧缩使阿尔及利亚政治局势面临潜在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恶化最终引发了1988年的“黑色十月事件”^②。沙德利政府为平息社会动乱进行政治改革，通过颁布1989年宪法赋予群众组建政治性组织的自由，使阿尔及利亚迈向多元民主政治。

第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贯穿殖民时期两种叙事互动历程以及独立后国家社会制度建设的一条逻辑线索。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百废待兴，民众的自管运动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政府的引导下，自管制度很快融入新时代民族身份内涵之中，成为精英与群众共同反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昭彰标识，也因其自发性而被视为对殖民主义叙事负面影响最有力的反击。尽管自管社会主义因1989年宪法的颁布而宣告终结，但其奠定了阿尔及利亚国家建设的制度基础，甚至因其自管制度的独特性为阿尔及利亚在第三世界中赢得了良好声誉。

第四，宗教与民族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历史叙事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民族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重要象征维度，在殖民主义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的书写中都被记以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民族主义叙事整合后，伊斯兰教成为在思想上团结民众的精神象征，也在当代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基本维度。本·贝拉时期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

^① “Contribution: l'Algérie, une Histoire Millénaire dans la Resistance”, *El Moudjahid*, July 4, 2022, <https://www.elmoudjahid.dz/fr/1-evenement/contribution-1-algerie-une-histoire-millenaire-dans-la-resistance-185241>, 2023-10-09.

^② 黑色十月事件，又称为“十月危机”，指1988年10月阿尔及利亚爆发的群众抗议事件，抗议引发当局的暴力镇压，最终以军方力量干预而息停。抗议群众最初的诉求是改变艰苦的生活现状，后发展为对经济社会的变革要求。这一事件推动了民主化改革进程，间接成为阿尔及利亚十年内战的诱因。

义”等概念，将宗教因素整合进国家政治发展的表述中，这表明运用宗教表述可以为其政治发展谋得更多的民众认可。但这一概念并未成为本·贝拉对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唯一诠释，所谓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只是政府当局为调和伊斯兰教思想与社会主义原则的权宜之计。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入世性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政治地位为 20 世纪末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在族际关系方面，由于民族主义叙事在解构殖民主义叙事时对柏柏尔民族相关问题的忽视，导致族际关系成为影响民族国家稳定的棘手问题。殖民主义叙事在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了严重隔阂。民族主义者因卡比利亚地区的柏柏尔人曾大量移民法国而对其立场始终存有疑虑。虽然柏柏尔人不反对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社会实现同化，但也同样抵触法国的殖民统治，因而在民族解放运动阶段也贡献了非凡力量。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宪法规定阿尔及利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①政府对柏柏尔民族属性的忽视引发柏柏尔人的不满，甚至在卡比利亚地区出现了以埃特·艾哈迈德（Ait Ahmed）为首的反政府组织。^②布迈丁执政时期，再次忽视了柏柏尔人的文化内涵与民族属性，民族问题进一步放大。柏柏尔人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的代价与独立后遭受的忽视之间形成巨大的情绪落差，导致柏柏尔复兴运动及“泛柏柏尔主义”的出现，成为困扰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政治稳定的原因之一。

第五，民阵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胜利，使“阵线”组织模式成为党禁开放后政党组织的效仿对象。作为“阵线”政党，民阵将各民族主义派别的分歧进行模糊处理，形成统一领导和叙事方式。这种模糊处理分歧、建设统一政党的“阵线”模式对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党的组织形式产生重要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批政党组织在新的宪法框架内得到国家承认，其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包括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伊斯兰拯救阵线，二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议会选举中都取得了不俗成绩。社会主义力量阵线致力于促进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提高柏柏尔人在各个方面的社会地位。伊斯兰拯救

^① 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 193 页。

^② 该反政府组织名为“社会主义力量阵线”（Socialist Force Front），1963 年 9 月发起反对本·贝拉政府“种族法西斯主义”的叛乱，共持续 10 个月，遭到政府镇压，最终流亡欧洲。See Paul Silverstein, “States of Fragmentation in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port*, No. 237, Winter 2005, p. 27.

阵线主张在伊斯兰教的指导下解决一切问题，对组织内部分歧的处理与民阵如出一辙。^① 在其后的选举进程中，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胜利，一度威胁民阵的执政党地位，最终在军队力量的干预下终止危机发展，但也因此引发了阿尔及利亚长达十年的内战。

五 结语

历史话语叙事影响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认同乃至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从法国殖民者的视角看，它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东方学塑造是其巩固统治合法性与秩序的关键一环。殖民者通过塑造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试图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纳入西方文明的框架中。这种叙事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是法国殖民者为了实现多民族共存、维护殖民帝国统治的产物。它不仅仅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的简单界定，更是殖民者权力意志的体现。然而，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发现与确认自身的民族身份是对殖民主义叙事进行否定与颠覆的根本所在。这种身份认同不仅关乎民族的尊严与荣耀，更是实现独立与平等诉求的重要根基。这种叙事范式旨在通过对他者的排斥与对立，明确自身历史与身份的独特内涵，进而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反对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虽然殖民主义叙事与民族主义叙事在很多层面表现出本质矛盾的特征，但从两者相互交织的历史演进视角来看，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

安东尼·史密斯在论及民族时提及，“那些正在被锻造的民族（无论是他们的边界还是特征）都是由殖民国家定义的”。^② 这一论点鲜明地指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在书写身份叙事时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互动。一是民族主义叙事诞生于殖民主义叙事作用下的社会秩序。殖民统治下的二元对立社会使不平等与剥削现象在阿尔及利亚屡见不鲜，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反思身份的现实基础。二是早期的民族主义叙事以驳斥殖民主义叙事为自身的构建逻辑。殖民统治时期，思想体系不够成熟的民族主义者

^① 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两位创始人分别是贫民区出身的伊玛目阿里·贝尔哈吉（Ali Belhadj）和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阿巴斯·马达尼博士（Abass Madani），二人大相径庭的社会背景也是分歧模糊化的例证。

^② [英国] 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页。

通过从不同角度解构殖民主义叙事而实现自身构架。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修正书写、对种族负面形象的否定等，都是早期民族主义叙事发展的重要内容。三是两种历史叙事通过政治实践的互动争夺话语权。历史叙事的实践性决定了叙事转变进程与反殖民进程的同步发生，其过程也映射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轨迹。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不仅标志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意味着身份叙事实现了民族主义转向。然而，殖民主义叙事的负面影响并不会因历史事件的发生戛然而止，反而会给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带来持续挑战和阵痛。因此，民族主义叙事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变革、完善与丰富，以应对这些挑战。

从文化角度来看，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文化非殖民化的历史过程，而其核心便是对殖民主义叙事框架内民族身份内涵的“祛魅”。在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间的争端充分证明“叙事之争”正以全新的形式呈现，比起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历史与意识形态的交锋之中。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①因而，阿尔及利亚面对这一时代挑战时，立足民族身份的民族主义叙事基础，建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强化文明自觉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与传承，也是抵御外部文化霸权渗透、维护本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对全球文明多元格局的积极回应与参与。与此同时，文明平等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也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客观还原、促进文明进一步交流的重要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打破历史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正视历史叙事，以此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实现真正的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法国]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Reshaping the Middle East Orde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ang Zhichao & Liang Zhiling

Abstract: Amid profou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the Middle East is undergoing continuous adjustments and intense turbulence, with its regional order facing historic reshaping. Among the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is process,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new or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ighlights its hegemonic diplomacy and coercive peace policies. “Trump 2.0” impacts the region’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ethical norms on five levels—ethical values, ideology, institutional norms, behavioral logic, and policy practices—exacerbating the imbalance, dysfunction, and disorder of the Middle East order, and accelerat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oward a “post – American era”. Firstl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regional actors is accelerating its tilt. Regional dynamics ar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with Israel,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emerging as the “new triad” of power. Iran and the “Resistance Axis” have been severely weakened, while the configuration of external forces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driven by the “chilling effect” of the Donroe Doctrine, the Middle East order is gravitating toward the “law of the jungle,” reinforcing the logic that “might makes right.” National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n the region have risen markedly,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rdly,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more turbulent and uncertain, with the trend toward a multipolar Middle East accelerating.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regional power vacuum, the re – calibration of core regional issue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paralysis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further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gional countries are seeking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multipolarization is also accelerating.

Key words: Donroe Doctrine; Trump administration; America First; regional development; Middle East order;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lgerian National Identity

Liu Aijiao

Abstract: Algerian national ident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ultural foundation of modern nation – state identity and a critical resource for colonialists and nationalists in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lonizers uti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lgeria's history and national imagery to compose the colonial narrative with "Orient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shaping a "dualistic and opposed" social order within colonial societies on this basis.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fueled the sprouting of Alge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sts from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social equality, independence aspirations, and cultural revival, reflected on the connotations of Algerian national identity within the colonial narratives and proposed diversified nationalist narrative paradigms. These paradigms include the assimilationist narrative, the Messalism narrative and the Islamic reformist narrativ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a powerful response to the colonialist narrative. The nationalist narratives gradually clarify the subjectivity and uniqueness of the Algerian nation by refuting the colonial narratives, and continuously integrate internal forces through political practice, promoting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is narrative shift from colonialism to nationalism apt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Algerian nationalism's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ation-state,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tinues to pose challenges to nation-building. In the new era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multi-civilization, the nationalist narrative still needs to continuously enrich, develop and improve itself to better meet challeng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historical narrative; ethnic identity; Algeria;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From Colonial Legacy to Local Reinvention: The Dual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Algiers

Liang Yuhong & Luo Lin

Abstract: The colonial rule imposed a dual structure on the urban space of Algiers,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 division between colonial and indigenous spheres. This duality has had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giers' urban space after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colonizers constructed a "space of conquest," physically,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shaping segregated spaces that split Algiers into distinctly colonial and indigenous urban forms. After independence, both nationalism and Islamism sought to restructure this inherited spatial order from different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however, neither succeeded in dismantling the dual urban structure created by colonial rul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s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Algiers. By 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the